

编 辑 说 明

为了研究中共东北地方党史和东北抗日联军史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访问录选编》第3辑。

本辑选编了于保合、张风岐、朱新阳三位同志的访问录，共计19份。其中有我所访问搜集交换来的并经我们交给本人阅改的有7份。本辑按被访问的老同志、访问的时间、访问录和回忆录先后顺序排列的。在选编中除增加副标题、对标点、文字和结构，做了一些改动外，基本上保持了访问录的原始性。

本辑系内部资料，未经全部核实，仅供参考，不宜外传、翻印和公开引用。由于我们编辑的水平不高，肯定会有一些错误和缺点，希望批评指正。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地方党史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目 录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三日）
——“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春、吉林市的学生运动……………1 - 4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森满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的前后，东北抗日
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以及金景叛变经过……………5 - 11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2 - 17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关于对赵尚志的估价问题……………18 - 22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
——珠河游击区情况……………23 - 26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九三八年以后小部队活动情况……………27 - 40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
——有关三军中的朝鲜同志和珠河根据地情况……………41 - 43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回忆赵尚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情况……………44 - 56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于保合同志革命简历与珠河中心县委联席会的

| | |
|-------------------------------|-----------|
| 经过情况····· | 57 - 60 |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 | |
| ——一九三七年帽儿山会议情况与一九三九年 | |
| 赵尚志回国活动情况····· | 61 - 66 |
| 于保合同志回忆录（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 |
| ——回忆抗联斗争片断····· | 67 - 80 |
| 于保合同志回忆抗联三军留守团、四师组成及 | |
| 活动情况（一九五四年）····· | 87 - 97 |
| 访问张风岐同志记录（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十三日）····· | 98 - 108 |
| 访问张风岐同志记录（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 |
| ——抗联三军三师远征经过····· | 109 - 115 |
| 访问张风岐同志记录（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 |
| ——回忆金策同志的事迹····· | 116 - 119 |
| 访问张风岐同志记录（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 | |
| ——关于抗联三支队和野营时期的情况····· | 120 - 126 |
| 张风岐同志回忆录（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 |
| ——回忆抗联三军作战活动····· | 127 - 134 |
| 访问朱新阳同志记录（一九六二年） | |
| ——昂昂溪五中党团活动的情况····· | 135 - 139 |
| 访问朱新阳同志记录（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 | |
| ——关于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有关 | |
| “六三”秘信的经过····· | 140 - 144 |
| 朱新阳同志回忆录（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 | |
| ——关于中共珠海县委及抗联三军部分情况的回忆····· | 145 - 155 |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

——“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春、吉林市的

学生运动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三日

(此件经本人审阅修改)

我在1930年春入长春私立自强学校，在这以前，我在伊通县中学念书。金景和我都是伊通县人，从小学起就是同学。一九二八、二九年，东北受关内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很大，但在县中还没有政党的组织，只有些进步的国民党员。有一个县中的教员是国民党员，可能受国共合作时党的影响，对李大钊牺牲表示同情。

长春学生对新文学很感兴趣，开化一些，反对旧礼教的斗争远比伊通先进。有一个国文教员叫李少一，是党的同情者，拥护并宣传鲁迅的文学作品。自强学校的学生那时多数同情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受新文学的影响较深（如“呐喊”、“彷徨”、“拓荒者”、“母亲”等小说）。校长杨世祯很反动，他是王荆山忠诚的奴才。当时在学校中出现过传单，是自发的，主要是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同情共产主义，反对封建教育，那时学生革命热潮很高。但也有些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他们只是唱高调，也同情共产主义，还有些人是在寻求出路。

1930年末在自强学校毕业。自强学校的毕业生中出了一批革命干部，我们那班同学很多都参加了革命。如：郭连樵（郭锋前东北局组织部

长)、李树声(曾任部队参谋长,已牺牲)、纪又文(纪坚博,“北京英文周报”社长)、刘蛰(刘志贤、陆平,现北京大学校长)、李广居(一九四六年在吉林军医任教育科长)、杨振华(一九四六年任九台县县长,外号叫“地雷”)。这些人在“九一八”以后都进关了。

一九三一年入吉林一中,那时党的活动是有的,主要在学校中,在工人中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在学校中经常闹学潮,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束缚,提倡白话文,自由、民主、平等,反对封建思想教育,提倡新思想教育、新艺术作品……”可是张学良当局限制我们,那时教育界大权完全操纵在旧礼教人物手中,吉林教育局长荣孟枚,十分腐朽反动,我听过他的讲演,极力宣扬吹捧“孔二先生”。学生要求学校改革学制,学生经常阅读“唯物论”、“辩证法”,也有读“资本论”的,最流行的是看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以及鲁迅、高尔基的小说。

女师也起过学潮(一九三一年),学生罢课,要把校长抬出去游街。学潮是否由党领导,不太清楚。当时政治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此不大干涉,但反封建却受干涉。在县中时也搞过学潮,反对当局官僚花钱买议员,口号是“打倒王化南,花钱买议员”(伊通县),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政治目的。吉林一中也罢过课,反对压迫新思想,响应女师的罢课。记得还画了漫画,有一张漫画的题目是“走新潮流长脚气”,用

以讥讽当局的压制。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吉林城内学生罢课是经常的。那时学生看新书得偷偷地看，否则被学校发现就没收。新旧思想的斗争、不断地学潮锻炼了进步的青年学生，使他们认识了当前的实际，教员也深受影响。总之，反对旧的，提倡新的思想是正确的，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有些较反动的教员，经过这样震动也老实一点，气焰收敛一些，不敢那么嚣张了。那时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公开的，有一次讲演会，学生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吉敦路”的问题，当时教育局长荣孟枚也参加了没说什么不好，也未表示赞同。吉林一师学生张长元，讲资本主义没落、经济危机，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但有些是唱马列主义高调子。经过学生一闹，当局对学生的压迫就稍稍松一些。学生民主空气抬头，敢于和旧礼教对抗，一中有一个心理教员，很顽固，大家要撵他。这时学生的民主空气很浓厚。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在十一月分开学，这时人民反日情绪非常高涨。1932年吉林一中已有党的组织，带有公开半公开宣传活动，校长没法制止，但有时又欺骗宣传说：“有什么办法呀，适者生存，……我为你们好、不要反对日本人，死了不值得”。

日文、“孝经”课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增设的必修课，这是奴化教育的开始。日文代替了英文，“孝经”代替了三民主义（同学很多人已经不

信三民主义了)，党的吉林市委曾经提出反对奴化教育的口号，反对日文和“孝经”课，学生的办法是消极抵抗，上课时，大家就出去玩球。

一九三二年夏季以后，敌人在学生中打入了暗探。当时多数人不关心国事，三分之一的人同情革命，有少数坏家伙。党团组织已有基础，金景说他一九三二年冬去过磐石，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说我也想参加团，求他将来给我介绍一下。我们经常去李世超家，谈些读书心得（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找他给解答。

李世超是女师“孝经”教员，以此掩护革命活动。他对同学说：“我讲我的，听不听在你们，看其他书放在底下，要听就批判着听。我教“孝经”是为的混碗饭吃”。他讲课学生听不听都可以。他经常向同志们宣传军阀卖国内幕的情况。我们认为他是好人，靠近他，经金景介绍逐渐就认识了。他是吉林地下党——吉林市委的负责人，与李维民在一起工作。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

——在满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的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以及金景叛变经过。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此件经本人审阅修改)

一九三三年，省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反对“左”倾路线，实行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在这以前，游击战争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强盗占领东北后，东北军主力退入关内，一些散落的营、团部队组织成自发的反日武装，“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成分极其复杂，散兵、游勇、股匪、帮会武装和我们的游击队到处皆是。有的是军阀部队，其中较大的有马占山、丁超、李杜、苏炳文，唐聚伍等，各树旗帜，无人管领，不成体系。铁路沿线城镇已被日寇侵占，大汉奸熙洽、于芷山等投降日寇，熙洽等无耻地献媚求宠，导引日寇到处收降收枪。

那些在广大人民群众和下层士兵抗日救亡声浪推动下打起抗日旗号的旧东北军官，虽然有些抗日行动，但他们对待人民群众仍旧采取原来的欺压手段，不同的是又加上了明火抢劫的方法，与土匪无异。其中一些小部队，报山头名号，口头宣传打日本，实际专干土匪勾当。有时各路股匪，汇合攻打县城，烧杀抢掠，破坏性极大。土匪之危害，有时也涉连地主，甚至大地主也不敢轻易触犯土匪，土匪抢了他，他就去压榨农民，从农民身

上捞本。农民有因仇杀地主人命、烧毁其家宅房屋、无处投身而被迫加入匪伙的；也有地主被土匪烧掠一空无法过生活而入伙为匪，比原来更坏。

为了抗击日寇，扩大反日力量，我们和土匪、山林队约订协议：“不抢掠民众，不骚扰民众，不打骂与侮辱民众，共同打击日本强盗”。在党的领导下，对这些队伍加以整顿，有的入了我们的游击队。

磐石游击队创建很早，最初由朝族同志创建，领导人是李红光，以后叫做红军三十二军红色游击队，他们对土匪订以纪律约束，一般错误进行批评警告，问题严重或屡教不改者即予缴除武装。磐石游击队是党的基本武装。

珠河游击队最初也是红色游击队，以后搞统战改为“反日”字样。凡抗日者都吸收参加队伍。在部队所在区域，一方面是发展党、团组织，另一方面是广泛的组织抗日分子加入群众组织中采（如“反帝大同盟”“农民协会”、“工会”等），儿童团最初好象叫“共产儿童团”（珠河，佳木斯地区都有）。

1933年改称“东北人民革命军”，共辖六个军，这已经比反日义勇军前进了一步。

1936年八月一日，统一番号为“东北抗日联军”。

“王康指示信”右倾一些，我在珠河县委写纲板抄写过这个材料。

下面谈一谈金景叛变的经过情况：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五七”国耻纪念前夜，共青团组织下令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在一夜之内贴满全城。传单、标语，均用五色油印。当晚入寝，我与金景在北炕挨住，在南炕于克和郭锋挨住。当晚金、郭两人一夜未归。翌日拂晓日本特务突然到寝室搜查，一无所获。将我与于克带走。当时我已知道金景参加组织，估计是出事了。

金景父亲是“盛京时报”吉林分馆的编辑，专门写文章敲竹杠，收割金钱，社会上略有“名气”，吸鸦片烟，开设烟馆，很象黄世仁的派头。金景本人风流浮夸，清高自持，耍小聪明，总唱高调。

我和于克到了日本宪兵队，令我们面对着墙壁坐下，不准四下张望，也不准交头结耳。少顷，宪兵将金景、郭锋带来，日本特务开始讯问。日寇先是利诱劝降，开始金景还硬装坚贞，等日本人打了他二个耳光，他就“唉呀！妈呀！”的叫唤起来，连哭带喊：“我说，我说！”于是，把他所知道的党、团情况全向敌人供认出来。更可恶的是他供出了秘密印刷所（李维民同志家）和一中、一师、女师、五中、毓文等学校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等20余人的名单。凡是知道的，他全出卖给敌人了。日寇一边审讯，一边按金景提供的名单四出捕人，摩托车整整吼了一天一夜，第一批捉来的有张家珍、王秉×，以后就不知道了。郭锋挨了打，但未招认。

由于金景未供出我和于克，我们便设法出去。我理直气壮地问他们：我叔父在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当科长，你为什么捉我？当晚，放我出去，告诉我不能在外边泄露秘密，不准离开，随传随到。我离开宪兵队却直接回到学校，同学们都围上来询问情况，我说：“金景都说了，把人都咬了”大家都气愤地说：“这小子真坏！”我叫一位同学马上给李世超送信，他说李老师已经走了。我又叫他通知刘蛰、于慕莲赶快逃走。于克晚我二十天出狱。这以后，我于七月分请假去哈市叔父家，一方面是打算躲一躲，暂避敌人毒锋。同时，心里很闷的慌，想找到党的关系。这时，对敌人更认清，更加仇视，一心想参加组织。知道“满洲省委”在哈尔滨，想找到省委，把金景叛变的罪行汇报给省委。当时也想去游击队，但又怕人家误认自己是日本派去的奸细。为了寻找关系，我经常在街头游逛。一天，在江沿碰见了李世超，他们装成工人，把分发剃成了光头，一脸胡子。我汇报一切情况，他问我对金景应持怎样的看法？我回答说，金景是个叛徒，不是朋友了，应该当敌人看待。他说这样认识很对，我说我想入团，求他介绍一下，他把我领到李维民住的小房子里（头道街，临江，与两家俄国人为邻）同我细谈，问我怕死不怕？我说不怕，死也是为革命，有价值。他介绍我见了李维民，李好象是文华中学的学生。维民同志同意介绍我入团。不一会，世超走，冯仲云来（他在伪“江上军”学校当数学教员，穿

一身好衣服)，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可以入团了。”并规定好接头联络方法。以后，李维民租小船在江心向我讲革命工作问题，又按期由工大的孙跛子给我上团课，讲党章，讲中央苏区情况和东北抗日游击区情况，一般每三天一次。给我读了一些团的文件。不久，派我返回吉林，以读书为掩护，设法恢复吉林团的组织。临行前，冯仲云给我两盒藕粉，内藏党的文件和一些宣传品，叫我转交给吉林铁路局的卢铁川，如找不到就存起来，必要时烧掉。其次，要我慰劳狱内同志。再次，以后和团省委发生关系。当时团省委书记刘明佛（河南人，叛徒）。约我在工大宿舍，边走边谈，要我恢复吉林团组织，注意秘密工作，规定通信联络方法，密写方法（淀粉、典酒），对省委的正式报告皆需密写密送。通信点是哈市道里商务街复式海记传习所李逸民收，每半月或一月报告一次。叫我物色发展一批团员，成立团的区委，并任区委书记。回吉时，给我拿了四盒“种”烟，其两盒内藏文件。同时，让我物色发展一批人送往游击队。孙跛子指示我，要利用合法形式做不合法工作，通过外国组织开展工作，发展团的组织。愿抗日者即加以团结。

三天后，去吉林。到吉林后，首先去找吉铁局的卢铁川，不在；又弄几个钱买些水果罐头到吉林看守所探监。以同学关系找冯玉生，会见时，我说：“朋友们问你们好！”他说：“郭锋很好，金景不太好，我

们和他不怎么合”。我指着送去的食品告诉他：“这是给大家吃的，不给金景。”

每个礼拜省委都有一次指示信，催促开辟工作。但由于我水平低，又无工作经验，过于谨慎，活动面很狭小，省委批评这是“关门主义”。发展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王正绪，曾任吉林市教育工会付主席、吉林联合中学付校长）。

一九三三年九月，省委指示在“九一八”纪念日要有行动，散发传单。王正绪在学校理化实验室做助手（试验员），利用室内的油印机印刷传单。画了些漫画。在九月十七日晚间从河南街到北山，再转到粮米行，散发一周。传单一般署名“吉林团市委”或“红军第四军宣传部”，以造声势。事后汇报省委，省委予以表扬，干的更有劲。

发展组织不大胆，怕出“金景第二”。王正绪的小舅子是一个预备团员，还有一个路警也打算发展入团。另外，还有几个人做“群众”。我们专找穷家庭的穷学生。小古烈士当时在吉林开三友书店，我的同学，他曾问我找到组织没有？我未敢回答，因为传说三友书店中有托陈分子，怕出问题。一九三四——三五年我入党后，他在哈市“大北新报”社当编辑，见到过。他很早就加入了“左联”。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在学校毕业去哈市。这时通信地址已改为法政大学张化一，到哈后接头，告诉我这是军委系统的。谈了几次话，最后决定

派我到莫斯科学习军事，期限一年，然后回国工作。我说我不够条件，打算继续念高等师范。他说世界大战马上就会爆发，升学念书不做革命工作有什么意思？最后我同意组织决定去莫斯科学习。

一九三三年冬由绥芬河越境去苏，一九三四年九月学好回国，由满洲里越境，在扎兰屯上车，至哈尔滨市住几天然后去上海。在上海规定与一英人接头，但久等不来钱已花光，只好返回。先到长春，然后找到李世超，审查一月后才接上关系，先写一书面报告，经省委调查属实，于是派往珠河游击区。

(顾民、李长浦、陈铁健访问，陈铁健整理)

访问于保合同志记录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此件经本人审阅修改)

关于东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从全国说，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以前，一切都是红色的：“红军”、“红色游击队”。东北地区的赤色游击队，从一九三三年的“一二六”指示信以后，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为抗日游击队。我谈这个问题，也只能限于我所知道的三军的一些情况。

赵尚志原是黄埔军校教导队的，大革命以后来东北工作，在立三路线时期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尚未恢复，此时被党派往孙朝阳部队工作，同去的还有几个朝鲜同志（如李根植、李启东），他们在孙部，一方面搞上层统战工作，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以后工作暴露，匪首欲除掉赵等七人，于是赵等七人携机枪一挺和步枪几支跑出，县委又卖一些手枪，在县委领导下，缴了几处大排、局所的武装（有一夜里连缴三处局所），俘辱愿参军者可以参军，不参军放走，缴除地主武装的地区就变成游击区了。伪满军队已无法控制，青年积极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即增至四十余人枪。但是这样小的队伍，刚刚成立，也很困难，周围的山林队都是几百人，往往冲突起来，人被扣押，枪被缴去，甚至威胁

生命。广大的义勇军的下层士兵拥护我们，其首领则怕我们抽他的底，把他们搞垮，总想趁机吃了我们。所以最初我们力求避免跟他们打交道，少惹是非。不能打，就和他们讲道理，讲共同抗日，宣传只有抗日才能站住脚，只有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败日本存在下去，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友军联合抗日。这些部队的头子有两面性，对我们的宣传也听也怕。有些部队我们派去了政治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做政治宣传工作。老百姓多拥护我们，他们则不得人心，群众说共产党的队伍好。

一年后，部队增至三、四百人，到一九三五年已扩编为四个团，每团四、五百人，团下辖连，每连约一百二十人左右，枪种很多（三八、七九、捷克式），也有机枪，每团一挺，军部有二、三挺，装备很好。打过方正、宾县、三岔河（是役李根植同志牺牲），打完即撤出转入山林，军队声势很大，纪律也好，远近闻名，百姓拥护我们，地主不敢跟我们斗，山林队也不敢欺侮我们，反而怕我们了。“九江”股匪被我们缴了械，匪首“九江”被我们杀掉，得了一些枪，去了个祸害。但义勇军害怕了，说“赵尚志太厉害”，不敢接近我们，不利于统战工作，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派人到山林队串通宣传，约其协同作战，“抗日就是朋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以保持独立性，但必需尊重群众利益，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我们部队和山林队都是向群众捐粮捐款，款只捐地主、商人，